

追踪理论^[1]

[美国] 马歇尔·布朗

理论的好时光正在殆尽；时间已晚；而理论家唯一能做的就是这么说。

——斯坦利·费什，《后果》

去“追踪”（go after）一样东西，就是对其跟随、追求，或者指控告发。追踪理论通常从违背理论开始，但从未在此结束。最终“追踪理论”便融合了 after 一词的三种含义。近几十年来，许多学者一直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措辞来反对理论，并追踪理论。本文回顾了过去的立场与做法，目的不是去试图统一那些不同的、多多少少具有争论性的陈述，而是说明我们已经多少次错失良机。批评家们寻求更好的理论、理论的替代，以及分置理论的资源，但是，正如我将提出的，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我将这些作者非正式地分为四种类型，称之为前理论（ex-theory）、反理论（against theory）、无理论（without theory）、后理论（post-theory）。虽然例子不能证明什么，但是他们确实可以累加起来，并且将指向——在我看来——它们累加的结果，这其中带有的两个历史根源就是浪漫时代的两位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你可以否认或甚至谴责某个理论家的过度阐释，但是理论，从根本上讲，就是方法的整合，除非陷入不一致，否则你是不能将理论“本身”打发走的。然后我会以一首“理论”（现代狂潮）之前的诗歌来结束本文，当然不是在古老的、未着重引用的理论出现之前，在它已经预先提取精华之前——诗是不会这样做的。

每个人似乎都知道反对理论的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一运动开始于他们在读研究生期间。不管他们是谁，他们在研究生院学习的时候；那是这种运动开始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开始于雷蒙德·皮卡德（Raymond Picard）对年轻的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恶毒攻击，当时皮卡德写了一本书，题为《新批评还是新骗子？》（*Nouvelle critique ou nouvelle imposture?* 1965）。在《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选》的主编文森特·利奇（Vincent Leitch）看来，反理论运动“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2] 尼

[1] 译者注：该文章的英文标题“Go after Theory”包含三种内涵，因为 after 有三个含义：“追踪”“跟随”和“反对”。本译文只能选其一种作为标题。

[2] Vincent Leitch, *Theory Matter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57. 利奇的书首发是在 1970 年，关于理论的第一篇文章可以追溯到 1977 年。

古拉斯·罗伊尔 (Nicholas Royle) 于 1984 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 他在 1981 年的会议论文《后结构主义: 理论的终结》(“Poststructuralism: The End of Theory”) 令人记忆犹新。^[3] 对于其他人而言, 这场运动可能开始于前弗洛伊德学派研究者弗雷德里克·克鲁斯 (Frederick Crews) 的《维尼的困惑》(*The Pooh Perplex*, 1963), 或约翰·埃利斯 (John Ellis) 的《反对解构主义》(*Against Deconstruction*, 1989), 或前拉康派学者迈克尔·博尔奇-雅各布森 (Mikkel Borch-Jacobsen)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对拉康和弗洛伊德的批评。丽塔·费尔斯基 (Rita Felski) 给人留下的印象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理论刊物 [分别在 1971 年和 1974 年创刊的《辨析批评》(*Diacritics*) 和《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 扼杀了理论的价值: “当我在 80 年代初进入研究生院的时候……文学研究已经被新政治化了……一整套的术语——知识、引用的事实、模仿——从文学理论的高度消失了。”^[4] 也许反理论确实始于前解构主义者, 沃尔特·本·迈克尔斯 (Walter Benn Michaels) 1982 年与人共同撰写了一篇文章, 题为《反对理论》(“Against Theory”)。

前 理 论

人们并不总是记得, 像其他几个人一样, 迈克尔斯在从事反理论研究之前就是一位理论家。他是创立于 1977 年的杂志《雕文》(*Glyph*) 的编委会成员, 这本杂志是美国第一本追寻德里达方向的期刊, 迈克尔斯在该期刊第一期发表了题为《〈瓦尔登湖〉的假湖底》(“Walden's False Bottoms”) 的一篇具有解构主义性质的文章。大卫·辛普森 (David Simpson) 的那本兼具思想性和学术性的著作《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对理论的反叛》(*Romanticism, Nationalism, and the Revolt Against Theory*) 则将反理论运动追溯回到 18 世纪、英式的基因密码。事实上, 我们从来就没有过后理论, 正是因为我们一直是反理论的。也许我这篇论文的题目应该是“理论及其他者”(*Theory and Its Other*); 但是我更喜欢我现在所使用的标题, 因为它本身的解构复杂性捕捉到了简单的真理: 在理论之后到来的是在追踪它, 既要追赶它, 又要锁定它。“Apprehend”^[5] 是另一个拥有两个完全对仗含义的英语单词: 理解理论就是监禁它。虽然并不需要对之感到忧心忡忡 (*apprehensive*), 但理论总是超出理解的范围。

正如我在文章开始所列的名单所显示的, 前理论家往往是最坚持追求理论的人。斯

[3] Nicholas Royle, “Déjà vu”, in Martin McQuillan et al. eds., *Post-Theory: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 <http://cw.routledge.com/textbooks/9781405859141/royle_bio.pdf>, 查询于 2016 年 1 月 1 日。

[4] Rita Felski, *Uses of Literature*, Malden: Blackwell, 2008, pp. 79, 81.

[5] 译者注: apprehend 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理解”, 另一个是“拘禁”。

坦利·费什（Stanley Fish）可能是其中最坚持不懈的一个。他以读者反应理论而闻名于世。读者反应批评理论是一种奇妙的理论，因为它是一种包含一切的理论。在最初发表于1981年的一篇文章（后收录到1989年出版的《顺其自然而为之》中）说到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时，费什确实原话是这样说的。^[6] 读者反应批评可以是关于读者对文本的反应，这可在伊瑟尔的《隐含的读者》（*The Implied Reader*）中见出，也可能是阅读文本的经验，这可在费什的《为邪恶所惊讶》（*Surprised by Sin*）中见出，或者是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的接受研究中的实证读者，或者是现实读者群谱，这可在诺曼·霍兰德（Norman Holland）的《五种读者阅读》（*5 Readers Reading*）中见出，或读者的心理，这可在霍兰德的早期作品《文学反应动力学》（*Dynamics of Literary Response*）中见出。当然，所有这些，几十年前就已经在I. A. 理查兹（I. A. Richards）的《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中被揭示。正如理查兹以罕见的机智所展示的，真正的读者读得很糟糕。但是我们可以忘记理查兹所说过的话，因为所有这些后来的批评者似乎都已经这么做了，或至少是大致这样做的。^[7] 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变化多端的读者。我们所针对的读者，我们构建的读者，我们得到的读者，我们看到的读者，我们感觉到的读者，近乎应有尽有！问题是，读者变得如此多变，以至于理论失去了它的方位。对于后期伊瑟尔而言，它成为田园生活般的游戏。对于费什而言，虽然他讨厌承认，但是它成为……解构。^[8] 他在1967年发表了《为邪恶所惊讶》之后，又在1972年发表了《自我消费的工艺品》（*Self-Consuming Artifacts*）。这里开始了一种前理论家的理论。这本书有432页，就在书的中间处——432页中的216页，费什开始了“放手：赫伯特诗歌中的自我的辩证法”（“Letting Go: The Dialectic of the Self in Herbert's Poetry”）这一章节。“放手”，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短语——释放和放弃，激励的同时解压缩。所以它现在如此，过去亦如此。1972年，当这本书出版时，赫伯特的诗歌被认为是“决定性地不确定”。^[9] 在关于赫伯特的章节（第157—158页）的开篇，费什以他特有的形

[6] Stanley Fish, "Why No One's Afraid of Wolfgang Iser", in *Doing What Comes Naturally: Change, Rhetoric, and the Practice of Theory in Literary and Legal Stud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68-86.

[7] 费什曾经不屑地讨论过理查兹的观点，参见 Stanley Fish, *Self-Consuming Artifacts: The Experience of Seven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p. 411-415.

[8] 费什与德里达被共同列入反基础主义批评者的名单之中。比如“Why No One's Afraid of Wolfgang Iser”（5个名字），“Anti-Foundationalism”（23个名字），“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3个名字）。来自 M. H. Abrams，见 Stanley Fish, *Doing What Comes Naturally: Change, Rhetoric, and the Practice of Theory in Literary and Legal Stud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68, 345;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05. 但他所找到的相关性是大体的，差异性较多也很具体。关于德里达的观点，见本文脚注 89。

[9] Stanley Fish, *Self-Consuming Artifacts: The Experience of Seven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 216.

式,确实放飞了理论。他说,赫伯特的“张力诗学”建立了“解决的与消融的洞察力”。^[10]事实上,在费什看来,赫伯特的诗歌所创造的这种洞察力具有“无情的压力”。你可能会感到困惑的是,所解决的为什么可以是无情的——一种放手是一种不放手——但就是这样它进入了前理论世界。费什将赫伯特的洞察称作是一种辩证法,虽然这是一种奇怪的辩证法,其中解决方法不是综合的,而是零散的。在费什看来,赫伯特的诗歌由三种消解构成:知觉框架的消解、自我的消解和诗歌的消解。因而它们产生了一种洞见,“使话语模式和知道他们自己那些是例子则变得多余”。而且,为了避免你在所有这些前理论游戏中错过了这一点,他在这一章节介绍的总结中重申:“阅读赫伯特的诗是感受所有东西的区分的解体。”^[11] 保罗·德曼 (Paul de Man) 和他的门徒们可能已经对这种不可否认的不可读性经典寓言的陈述感到好笑。对于早先的费什而言,阅读《失乐园》在理论上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在那首诗中,读者学会了做出区分。但是在前理论世界,这一情况则不复存在。现在你不是在学习,你只是“体验”。《失乐园》的读者也在体验诗,但他们不会就此停止:在这首诗中“结果是指令,而指令之所以成为可能仅仅是因为读者被要求观察、分析,并放置他的经验。”^[12] 但对于已陷入脆弱的、不具备理论化的解构主义中的前理论家而言,经验是无止境的,根据定义,他没有确定的内容。它只是继续走,继续放手。

这就是当你开始前理论运动时所发生的情况。然而《自我消费的工艺品》并非此类作品的最后一部。费什继续出版了一部篇幅较长的著作,讨论赫伯特诗歌中所被忽略的内容,该书的名字是《活生生的寺院》(*The Living Temple*)。在该书最后的章节,标题很响亮,“寺庙之谜的谜底”。在那一章的开首这样说道,“一个新的解释,像任何其他理论……”^[13] 这句带有费什风格的话语悄无声响地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从什么时候开始解释也变成了理论? 我们不是在这里放弃理论吗? 如果一个理论只不过是你的阅读或我的阅读,那么它是没有躯干的。它像蛇一样柔软而狡猾。这句话接下来是这样的:“像任何其他理论一样,新的解释与先前的解释相比,至少应该有两个优点:它应该更简单……并且应该提供更多解释。”所谓“更简单”,费什解释说,他的意思是这种解释应该具有更高的优雅。理论是美学的对象。像诗一样,它们是解释本身,而不是解释的结构;是建筑物本身,不是建筑的框架;或者最后用费什的终结术语来说,没有基础的结构。这本书的结论简短但切中要害。费什想让它听起来令人惊讶,甚至有些(前)解

[10] Ibid., p. 157.

[11] Ibid., p. 158.

[12] Stanley Fish, *Surprised by Sin: The Reader in Paradise Lost*, 2nd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1.

[13] Stanley Fish, *The Living Temple: George Herbert and Catechiz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 137.

构的意味，所以他称之为“一种结论，在其中看似任何事物都会被收回”。在文中他指出，理论只是文学史的名字而已，解释只是跟着来的直觉。示范的另一个名字是说服。这就是他从那以来一直演奏的曲调。在《顺其自然而为之》中，有一篇文章篇名为《反基础主义，理论希望，创作教学》（“Anti-Foundationalism, Theory Hope, and the Teaching of Composition”）。对于弥尔顿主义者而言，当然，希望是神学的“不可见物质”。理论是知识的基础。费什所说的反基础主义是指那些认为只有实践真正重要的理论。他说，“一种理论形式根本不是理论。”^[14]这正是那些追随理论的前理论家的情况。他们希望一种理论不是单一的，然后他们构建他们的希望，将其假装成别的东西的理论。

费什可能是最公开承认反理论就是追踪理论的人。反对某种理论实际上是假设你所反对的理论；反理论一般是提供一种与理论相反的理论；无理论是希望一种隐藏实践本质的简单阅读。所以他在1998年平装版《为邪恶所惊讶》的前言中这样谈论读者反应阐释论：“虽然《为邪恶所惊讶》并不包含这种理论的意义引用，但是它是理论的结果。”^[15]一种公开的关于罪责的忏悔铺平了通往天堂的道路。不仅仅是费什如此坦诚，下面一段来自理查德·斯特里尔（Richard Strier）在五年后出版的关于赫伯特的阅读的介绍：“这本书中的历史主题要令人信服，必须取决于我是否将诗歌的不可捉摸的地方理解清楚。阅读提供了主要的（尽管不是排他性的）主题证据，而主题指导这阅读。”^[16]斯特里尔用主题这一词汇，而非理论，但是这两个术语之间并没有多少差异的空间。其涉及面是相同的。主题或理论指导阅读；阅读证实了引导我们的理论。“一个人只能读他已经阅读过的。”^[17]我们总是在理论之后，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正在寻找什么，我们永远不会找到任何东西。

反 理 论

当然，还有其他种类的批评者，他们不是前理论家，而是从一开始就反理论的。他们是那种渴望在前理论到来的批评者，希望废除甚至忘记理论，忘记所有这些新奇的理论之类的东西。他们希望我们回到美好的旧日时光，那个时候，我们就是阅读。这一流

[14] Stanley Fish, *Doing What Comes Naturally: Change, Rhetoric, and the Practice of Theory in Literary and Legal Stud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42.

[15] Stanley Fish, *Surprised by Sin: The Reader in Paradise Lost*, 2nd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x.

[16] Richard Strier, *Love Known: Theology and Experience in George Herbert's Poet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 xi.

[17] Stanley Fish, *The Living Temple: George Herbert and Catechiz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172.

派的圣经是达芙妮·帕泰 (Daphne Patai) 和威尔·克拉尔 (Will H. Corral) 于 2005 年编辑的文集《理论的帝国：异见者文选》(*Theory's Empire: An Anthology of Dissent*)。该文选的导言部分中，第一段就声称，“理论化……看起来更像是指向一个死胡同了。”^[18] 带着一贯的、偏执的语调，编辑者认为理论与理论家缺乏“必要的哲学基础”，然后，对于逻辑与一致性的态度依次是：模棱两可的、武断的、荒谬的、怪诞的、可笑的、复杂得难以理解的、浮夸的、可被预测到的、啰唆的、派生的、无尽的重复、多余的、不宽容的、矫饰的、压抑的、疏远的、怪诞的（再一次）、政治狂热的、投机主义的和（以防你已经错过了重点）相当漠不关心的：矛盾、任意、荒谬、奇异、荒谬、不可读的复杂、夸张、可预测、憎恨、假装、镇压、异化、奇异（再次使用）、充满政治热情、不安、机会主义和（免得你错过了这一点）对逻辑和一致性非常漠不关心。这只是导言的部分观点。在“理论”的副标题中，索引中提供了以下内容：优胜主义、坏理论、从内开始的毁灭、恶化、如帝国主义者、如智力殖民者、不容忍、说行话、缺乏对文学的重视、机会主义、政治议程、拒绝进步的想法。^[19] 在编辑所处于的研究生阶段，社会学理论是“崭新且令人兴奋的”，对于那些易受影响的年轻学者有着明显的吸引力。但是这一切都变得十分糟糕，因为受到了“政治正确性”和“加速的后现代主义措辞”的影响，导向了一种“始终反对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20] 只要我们能够躲到这个恶魔的身后，那么在这些编辑还是学生的时候，或在那之前，这些事物多么良善体面啊！他们也许被认为具有此类的暗指，但是实际上他们否认任何具有退步倾向的复古情怀：“我们的

[18] Daphne Patai and Will H. Corral eds., *Theory's Empire: An Anthology of Diss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

[19] Valentine Cunningham, *Reading After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2002. 坎宁汉姆在开始的时候睁大眼睛看着：“阅读永远是在理论之后。我们每个人，作为读者，在理论的背后追踪，要么是这种理论，要么是另一种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始终都是，在理论后的，后理论家”（第 3 页）。但后来，经过了四章越发不情愿的赞美之后，他宣称，“理论家们，作为一个阶级，是糟糕的读者”（第 59 页）。而他所说的“糟糕”的意思是指他们的工作，除了其他方面的问题以外，“总的来说是骇人听闻的胡说八道”（第 99 页）、“卑劣低级”（第 109 页）、“虚张声势”和“废话连篇”和“恬不知耻的堕落”（第 117 页），甚至是“低级无聊”（dinkification）（第 128 页）。他确实举出了一些很好的例子，但是这些例证的精彩程度都不如他对斯坦利·费什格言的反拨：“轶事的复数体并不是事实”（第 73 页）。在讨论 I. A. 理查兹的《实用批评》中，他将理查兹的九大“批评难点”减少到五种“主要概念”，好像只有理论家容易出现第一种困难，不能够“生成浅显的意义”。参见 Valentine Cunningham, *Practical Criticism: A Study of Literary Judgment* (《实用批评：文学判断的研究》),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2004, pp. 14, 12.

[20] Daphne Patai and Will H. Corral eds., *Theory's Empire: An Anthology of Diss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7. 另一个“变味”的故事版本出现在凯瑟琳·博格思 (Catherine Burgass) 的作品中，见 Catherine Burgass, *Challenging Theory*, Aldershot: Ashgate, 1999. 博格思所用的标题双关语：她挑战理论，但是没有觉得其有挑战性。相反，在各种实例，它只是书中的一页而已——“像更传统的形式主义一样公式化”，“容易出现方法论不一致，和简单无知的问题”，也容易出现“鼓励对深度知识的肤浅和态度上的不严肃”（第 105 页）。然而，书中的始作俑者是跨学科，而不是理论本身。

书不是要回归到一个理想的过去（无论如何，这种过去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的介绍仍然将“现在所谓的理论”的“起始”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21]这其中皮卡德-巴特（Picard-Barthes）之间的争论是最早的被确定的反应。^[22]此后不久，他们将反理论写作追溯到“自从上世纪 60 年代晚期又特别强调 80 年代到现在”^[23]这段时间。事实上，此类作品最早可见于 1977 年和 1979 年（M. H. 艾布拉姆斯和韦恩·布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也恰好是当编辑在场的时刻；帕泰在 1977 年获得博士学位，克拉尔最早的出版物，我能够追溯到 1979 年。当然，没有黄金时代。反理论由来已久，因此有理论可以反对。也许从来没有一个时间是没有理论家或不受“他们的高度争执的前提”和他们的“标准辩论”影响的时候。^[24]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也认为，我们从来没有现代过，从来没有文化丰富过，也从来没有优于大自然。同样，我们古代过，天真烂漫过，或没有建构过。冲动和系统、直觉和调节、人才和培训、个性和社区、天真和感伤——所有这些不同的无理论或理论化的称呼，他们永远不能开解。虽然帕泰和克拉尔将反理论运动推到他们的研究生时代——如其他人所做的一样——他们的介绍事实上也回到鲍里斯·艾亨鲍姆（Boris Eikhenbaum）（“大约八十多年前”）^[25]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46 年）^[26]。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可能已经回到了牛津英语词典所引用的，首次将“理论化”作为现代意义词汇当动词使用的乔治·英尼斯（George Innes）：他曾在一篇叫作《军事基本原理》（*Military Rudiment*）、题词为“献给亲爱的读者”的短篇中，声称“没有东西能比实践更让理论如此好理解”。反理论已经从开始就跟随着我们身旁，并没有做出任何看得见的进展。

无 理 论

可能有一种不用理论的批评家存在吗？可能有一位只从事阅读的批评家存在吗？有没有只靠实践就可以更好完成批评任务的？如果这样，为什么总有像英尼斯写的那样的论著文章，在控诉和反对理论？不管怎样，没有阅读是绝对幼稚的。首先，你必须知道一门语言。除非你能数到 14，否则你就不能成为一个有能力读懂十四行诗的读者。甚至帕泰-克拉尔选集中的一位反理论家，理查德·莱文（Richard Levin）也承认，“一

[21] Daphne Patai and Will H. Corral eds., *Theory's Empire: An Anthology of Diss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

[22] Ibid.

[23] Ibid., p. 3.

[24] Ibid., p. 7.

[25] Ibid., p. 10.

[26] Ibid., p. 4.

种普遍真理：每种批评都假设了一种文学理论”（《沉默就是请求，不然诅咒你们美洛斯》^[27]）。但文学的理论与批评理论可能是不同的。也许假设一种理论和对一种理论宣誓效忠或是成为一个理论家都是不同的。反理论者活在一个理论的世界中，但是一个作为批评家的人能够生存在一个没有批评理论的世界或是模式中吗？那才真是伪装成反理论的后理论辩论的关键之处。

我所知道的最接近体现对纯粹的批评渴望的评论家是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文德勒是一个完美的细读者，她细读了从现代英语诞生至今的所有诗歌。她在鲁本·布劳尔（Reuben Brower）的指导下培养着战后的哈佛新批评学派，她一直渴望尽可能精确地阅读。布劳尔很少使用术语“理论”与其阅读实践相连；相反，他提到将“慢读”作为一种“方法”，这一观点特别参见于一篇名为“慢节奏阅读”的文章中。^[28] [反理论家辩论着新批评是不是理论，还有它是好还是坏，而有一种说法认为新批评“试图切断批评实践与理论思想的联系”。^[29] 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在布鲁克斯和威廉·维姆赛特（William Wimsatt）后期就读于耶鲁大学，就如同“理论”在进去，而它的对手们则在聚集。理论总是如此，它的对手亦然。]文德勒只是偶尔在她所写的文章中争论一下，态度温和而不急躁。和她的导师一样，她很少提到那些公认的理论家，甚至也使用“理论”一词。至多，你可以在她的赫伯特的诗歌研究中看到这一点：“一种诗歌的表现力理论最适合‘寺庙’一诗了。”^[30] 但一般情况下，文德勒只是声称是诗人的声音。“在我强调诗歌的连贯性、秩序和决心的时候，我强调的是赫伯特自己所要强调的。”^[31] 关于济慈，她的“概念框架”是“作者的选择”——通过想象作者所没有写的东西来理解作者。^[32] 在这方面，她建议手抄诗歌。^[33] 关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她甚至建议先将其背诵下来，并在她书籍的最后附带了一张她朗读的 CD。没有任何评论家可以比这个更让自己处于危险的自我抹消了。（你是否认将其认定为个人抹消取决于你的行为理论，若是没有理论，你甚至都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但是，即使是文德勒的反自我意识，也有其局限性。特别是在关于济慈的书籍“结论”中，她引用了两个公认的理论家。第一位是亨利·佛西隆（Henri Focillon）让文德勒得到了一种特权，即是“用诗歌原始的材料矩阵替换了

[27] Richard Levin, "Silence Is Consent, or Curse Ye Meroz!", in Daphne Patai and Will H. Corral eds., *Theory's Empire: An Anthology of Diss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72.

[28] Reuben A. Brower, "Reading in Slow Motion", in Reuben A. Brower and Richard Poirier eds., *Defense of Reading: A Reader's Approach to Literary Criticism*, New York: Dutton, 1962, pp. 3-21.

[29] Morris Dickstein, "The Rise and Fall of 'Practical' Criticism", in Daphne Patai and Will H. Corral eds., *Theory's Empire: An Anthology of Diss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63.

[30] Helen Vendler, *The Poetry of George Herber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5.

[31] Ibid.

[32] Helen Vendler, *The Odes of John Kea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5.

[33] Ibid., p. 3.

（济慈的）形式”。^[34] 这里便出现了危险：原创性是如何界定的？在重新替换形式（将其放回到其原属的地方）与用文德勒的不可替代的见解来替换它们和它们的原始矩阵之间的区别在哪里？然后，仿佛是要挑战理论家，文德勒引用了福柯的观点。“评论的唯一作用”，她引用说，“就是最后说出，有什么内容是一直处于深处默默地被阐述。”^[35] 然后，文德勒又重新解释了福柯的话语，为朗读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 CD 和完全颠倒理论家意思的行为埋下了伏笔：“然后，评论的结束，”她写道，“是重新朗诵这首诗……”^[36]

评论的结束似乎是为了结束评论。“从诗人的角度接近十四行诗……”，正如自己所声称要做的那样。^[37] 最后，只是在说这首诗。把这本书丢掉，保留 CD。这是真正的非理论家的道德。但不知何故，在过程中，总共有 672 页的文本和评论。很少有批评者会对一首诗有如此多的谈论。她当然不是一个前理论家，她是一位即将成为理论家的人，或者一个反理论者，或是一个无理论者？她对任何文本都有自己的观点。让我重复我最后的引用，填上我留下的空白：“理解这些十四行诗，就像我已经选择去做的一样，是从诗人的视角来看。”忘却理论，你仍然会有方法，有选择，有一种对这首诗歌的审视视角，即使这可能被认为是诗人自己的视角。至于这些鸣谢、让步和作古的俏皮话是否让文德勒成为一位理论家，我将在本文最后表达我的观点。但是很清晰的是，特别是在对莎士比亚的论著的多层次介绍中，尽管她有天主教的品位和标准，她在骨子里是一个方法论者。只是阅读，仔细地阅读，随着作者共同阅读；这些都是标签，都是方法，并且——就像我最后会说的——都是理论。评论的尽头尝试去绕着理论做我们在橄榄球中称作终点冲刺的事。但是那只是一种幻觉，或是一种修辞的活动。

一位更杰出的批评家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甚至在几十年前就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奥尔巴赫采用的一种方法是“将读者直接带到主题，并让他在理论期待之前感受到问题所在”，他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假装只是在阅读文本：“我面前长长的伸展开的道路是只有文本来指引。”^[38] 当然，奥尔巴赫完全知道柏拉图为追随某种方式创造了一个词“*met-hodos*”。他是没有理论的，但不是没有方法的——那种“包括由让自我被一些个我逐渐找出并没有一个特别的主题所牵引的方法”。^[39] 他是在写书的过程中找到的这些主题，还是方法走在先前之前呢？他没有明说，但是当他写到这些“主

[34] Ibid., p. 295.

[35] Ibid. 文德勒的这句话转引自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36] Helen Vendler, *The Odes of John Kea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95.

[37] Helen Vendler, *The Art of Shakespeare's Sonne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7.

[38] Erich Auerba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Willard Trask trans.,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57, p. 91. 英译略有修改。

[39] Ibid., p. 484.

题为我的研究指出方向”^[40]时,可以看得出主题开启了研究。他说为了确保“文本的大部分都是随机被选择的”^[41]——尽管实际上不那么随机,但是因为“这绝大多数……建立在偶遇和个人偏好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一个绝对目的视角之下,所以还可以这样说。”实际上,就连那种转述都是太绝对的。这些选择不是出于随机,仅仅是出于独断(beliebige),也就是说,它们是出于视角中的目的而被选择的,尽管其他的段落也许等同于被选择的,而且“随机相遇和倾向比有目的的选择更为即时”。他有过一个目标,而且这个目标并不模糊,仅仅是很宽广。他有过一个明确的倾向,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化”偏好,而随机性仅仅是采取一个样式而不是另一个来让被偏好的(并且偏好不只是出于个人化)因素来适应他的倾向。这是随机的,也许可以这么说。但是随机性并不是一个随便的种类。它是一个受奥尔巴赫的现实主义青睐的种类,整本书都在使用这个概念。你得不到一个现实开始于一个文体高处观望的讽刺视角的原因。从他的有代表性而不是出色的段落中找到的线索中当然是有目的的,或者在因为代表性的方面而不是独特的方面而处理它们的时候。然而这目的起初是广泛的,并且在完成的过程中获得了定义,就存在最初对主题的挑选和指引出他所追随道路的方法。而且尽管奥尔巴赫作了声明,但是所有读者都明白,在这里的方法只是缩小了的理论。

最后,后理论

但是,那些声称在理论之后的人又如何呢?当那些像托马斯·多彻蒂(Thomas Docherty)所写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irns)的《理论之后的理论》(*Theory after Theory*)、D. N. 罗德维克(D. N. Rodowick)的《理论的挽歌》(*Elegy for Theory*)、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以及简·埃利奥特(Jane Elliott)和德里克·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编辑的也名为《“理论”之后的理论》(*Theory after “Theory”*)的文集,我们似乎还是困在一个圆圈之内。因为,事实上,理论一直在回归,这些作者正在寻求理论,而不是放弃理论。多彻蒂明确地使用与我的标题具有同样双关语功能的词汇,还有另一个双关语:在此书的第一页上,他宣称他不打算追随理论来写理论的意图,当然不是写理论的尾声(write theory's wake),而是唤醒理论。书的后面还有一章,题目为“反对反理论”(“Against Against Theory”),实际上是批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以及沃尔特·本·迈克尔斯骨子里的实用主义。回归与关于理论的一个例子见2004年在《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杂志上发表的一组论文,结集出版后标题为《物》(*Things*)。物就像你所常见的朴素而直接。

[40] Ibid.

[41] Ibid., p. 491.